

在共同世界的邊緣探問生命政治： 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與難民營研究

Inquiring about the Bio-Politics from the Edge of the Common World: Michel Agier's Anthropology of City and Camp Study

陳瑞樺*

Jui-Hua CHEN

一、前言

城市與難民，兩者分屬不同的範疇，前者指涉一個文明空間以及與此空間相連繫的社會生活，而後者則意味著一種無依身分以及在民族國家所形成的政治空間中無所連屬的狀態。城市是共同生活的場域，而難民卻經常被排除在共同生活的外部，被懸置在共同場域的邊緣。

由難民延伸而來，難民營是個什麼樣的空間？它是如同城市一般的共同生活場域，還是如同難民狀態一般懸置無依的邊緣空間？對於法國人類學家米歇爾·阿吉耶(Michel Agier)而言，城市研究和難民營研究之間存在著一條貫通兩者的線索，這條線索是當代生命政治。

阿吉耶生於1953年。法國發展研究院(l'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指導員，2004到2010年間擔任非洲研究中心(Le Centre d'études africaines, CEAF)¹主

投稿日期：2019年1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月25日。

* 陳瑞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信箱：juihuachen@gapp.nthu.edu.tw

1 「非洲研究中心」由喬治·巴隆迪耶(Geroges Balandier, 1920-2016)創立，是由發展研究院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共同成立的研究單位(unité mixte de recherche,

任。阿吉耶的研究包含了兩條不同的軸線：其一是城市人類學，其二是難民及邊界的研究。在非洲研究中心於2011年刊出的網頁上，對阿吉耶的研究有如下說明：

其研究分析了兩個聯合的面向，並將其間的關係連繫起來。一方面是「異邦人」這個角色在不同國家和都市脈絡中的生產，另一方面是營區、轉運區、都市中的非法佔住等邊緣和邊界空間的形成和穩固，這些空間做為避難處所，以及生成中的都市脈絡。它意在掌握當前人類全球化之下進展和多樣的移住，以及在此架構下，以其不同形式而具體化（乃至都市貧民窟）的避難所樣貌。²

阿吉耶早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進行研究，包括多哥的首都洛美(Lomé, 1978-1979, 1984, 1986)、喀麥隆的杜阿拉(Douala, 1981-1983)、巴西巴伊亞州首府薩爾瓦多(Salvador de Bahia, 1986-1993)、哥倫比亞的卡利(Cali, 1997-1999)。阿吉耶主要是於經濟貧窮、社會邊緣、生活不穩定的街區進行田野調查，探討課題包括：社會流動、族群認同，特別是都市文化運動的興起。³

自2000起，阿吉耶轉而關注因為戰爭和暴力事件而產生的難民及流亡者，以及被迫遷移者的重組，由此試圖發展一種「移住與新都市邏輯的人類學」(Anthropologie des déplacements et des nouvelles logiques urbaines)。他在哥倫比亞和黑非洲的都市邊緣、難民營、轉送中心進行田野調查，對肯亞（索馬利亞難民）、尚比亞（安哥拉難民）、西非洲幾內亞、獅子山國、賴比瑞亞等國（賴比瑞亞難民和獅子山國難民）的難民營進行研究，並前往巴勒斯坦難民營訪問。透過比較分析，試圖掌握移住(déplacement)、都市邊緣性(marginalité urbaine)及認同污名化(stigmatisation identitaire)、邊緣和邊界空間的持續生產(la production durable de marges et

UMR)。2014年1月，「非洲研究中心」與「非洲世界研究中心」(le Centre d'études des mondes africains, CEMAf)及「地中海伊斯蘭社會史中心」(le Centre d'histoire sociale de l'islam méditerranéen, CHSIM)共同合併為「非洲世界研究所」(l'Institut des mondes africains, IMAF)。

2 <http://lodel.ehess.fr/ceaf/document.php?id=36> (2018/12/20瀏覽)

3 <http://lodel.ehess.fr/ceaf/document.php?id=36> (2018/12/20瀏覽)

d'espaces de frontière), 說明這些現象之間的連續性和當代性。⁴

本文的目的在引介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及營區研究，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前言之後，第二節將說明法國都市人類學的發展脈絡，由此定位阿吉耶的知識基點；第三節探討阿吉耶城市人類學的論點；第四節轉入阿吉耶對於生命政治的敏感空間形式的探討，以理解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與營區研究之間的關係。

二、法國都市人類學的發展軌跡

(一) 都市人類學在法國的建制⁵

在二戰結束以前，法國民族學家的研究對象，要不是非歐洲、無文字的民族，就是法國的鄉村社會。在這種古典視野中，都市被看成是鄉村的變質。

喬治·巴隆迪耶(Georges Balandier, 1920-2016)於1955年出版《黑色布拉薩維爾的社會學》(*Sociologie des Brazzavilles noires*)，以布拉薩維爾⁶這個城市做為分析黑非洲社會文化變遷的場域。對巴隆迪耶而言，城市就是變遷的實驗室。巴隆迪耶在1957年出版《曖昧的非洲》(*L'Afrique ambiguë*)一書，以「城市」作為第六章的標題，並於開章寫道：

我與達卡、康那克利、布拉薩維爾和李奧波德市（今日的金夏沙）、拉哥斯和伊巴丹、杜阿拉、自由城、阿比讓，以及凍結在往日榮光中的聖路易等非洲城市的相遇，引領我進行一項新的探險，這項探險於今人類學家已無法再逃避。距今不到十年，人們還可以繼續將這些城區設想為反常現象，將這些大型人類集居形式的叛亂當成是一種難以整合到文明體的異質要素。但是現在所有事情都改變了！（Balandier 1957: 231）

4 <http://ceaf.chess.fr/document.php?id=36>（2011/01/04瀏覽，網頁已不存在）；另見<http://lodel.chess.fr/ceaf/document.php?id=36>（2018/12/20瀏覽）。

5 本節對於法國都市社會學發展歷程的說明，除特別標明，主要整理自Gutwirth (2007)。

6 布拉薩維爾(Brazzaville)另譯為布拉薩市，今日剛果共和國之首都，與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夏沙(Kinshasa)隔著剛果河相望。

《曖昧的非洲》出版於法屬非洲殖民地於1960年代初期紛紛獨立之前，在殖民時期的尾聲中，分析了變動中的非洲在新與舊之間的各種辯證關係。在出版《曖昧的非洲》同年，巴隆迪耶創立了非洲研究中心，以變遷的視角展開對當代非洲的探索。之後非洲研究中心逐步發展，整合了人類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跨學科的視角研究非洲以及由這片土地遷移到世界各地的離散人口。

在巴隆迪耶以CEAF為基地所開創的殖民地／第三世界的都市研究傳統之外，法國都市人類學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傳統是由侯傑·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 1898-1974)、安德烈·勒華－古杭(André Leroi-Gourhan, 1911-1986)及他們的學生柯萊特·佩托內(Colette Pétonnet, 1929-2012)、賈克·古特維爾特(Jacques Gutwirth, 1926-2012)所開創的歐美都市人類學研究。

巴斯蒂德自1958年起於巴黎大學擔任「社會與宗教民族學」講座教授，在巴西巴伊亞州首府薩爾瓦多(Salvador de Bahia)進行田野調查。佩托內於1961年投入巴斯蒂德門下，在巴斯蒂德及勒華－古杭的建議下，在巴黎郊區進行田野調查，於1967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同樣在1961年，古特維爾特由勒華－古杭擔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在其出生地比利時安特衛普(Anvers)一個由納粹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組成的社區進行田野調查，於1969年完成國家博士論文答辯。古特維爾特及佩托內相繼於1968年及1969年進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繼續於都市進行田野調查。古特維爾特自1975年起於美國波士頓、紐約、洛杉磯等城市進行調查，於1978年發表論文〈都市民族學調查〉("L'enquête en ethnologie urbaine")，將研究地區擴展至美國。

巴隆迪耶一脈原本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田野調查，但其學生傑拉爾·阿爾塔伯(Gérard Althabe)於1977年因政治因素被禁止到海外研究，轉而在法國南特(Nantes)的中低收入住宅區(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 HLM)進行調查。在城區中，阿爾塔伯的關注焦點從傳統人類學研究所重視的親屬關係，轉為街區日常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係。阿爾塔伯於1979/80學年度起受聘於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教，其開授的研討課主題是「都市和產業人類學」。在他的組織下，「都市和產業人類學研究群」(Equipe de recherche

en anthropologie urbaine et industrielle, ERAUI)於1979年創立，並由他本人擔任主任。1981年起，ERAUI的主要著作陸續出版。

1980年代是法國的都市人類學研究建制完成並與國際接軌而蓬勃發展的階段，與都市人類學相關的研討會、期刊專題、導論著作、教學都在這個階段出現。古特維爾特和佩托內於1985年共同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創立「都市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urbaine, LAU)，與阿爾塔伯創設的「都市和產業人類學研究群」成爲法國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兩個重要群體。

綜言之，法國的都市人類學研究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建立，歷經1950年代巴隆迪耶在非洲殖民地的先驅研究、1960年代佩托內和古特維爾特在西歐都市社區的先驅研究，而於1970年代進一步開展，並在1980年代完成了都市人類學研究基地的建置。

(二) 從都市人類學到城市人類學

阿爾塔伯(1984)在一篇說明都市民族學發展趨勢的文章中指出，在當時的法國，社會認同成爲論戰的核心，族群、職業、地方等各種形式的認同都受到相當的關注。在各種認同之中，都市人類學以地方認同爲關注重點。在此討論熱潮中，學圈幾乎全面地放棄了實質論的認同觀，而採取建構論的觀點，將認同看作是社會關係發展的產物。由此，地方認同被認爲應該透過不同的生產與再生產形式來掌握，而非透過探究有著既定實質內容的傳統文化來呈現。

地方認同的考察與人類學的學科傳統有著親近關係。問題是，在當代社會，工作與居住場所區分的情況下，究竟形成了什麼樣的地方認同呢？是誰參與在地方認同之中？這一問題不僅關係到地方認同的討論，也關係到人類學整體觀知識傳統的重新界定。

在說明研究焦點及反省知識論之後，阿爾塔伯將1980年代都市人類學研究區分出三大主流：

1. 城市中的人類學(une anthropologie dans la ville)：共同居住空間，在其中展開的社會關係，工作與家庭的接合。

2. 城市的人類學(*une anthropologie de la ville*)：都市的社會性，承續芝加哥學派的觀點。都市的社會性加在個體之上，同時多樣性又提供了自主性。個人在預先建立的城市脈絡中自由地發展。
3. 對於城市的想像(*l'imaginaire de la ville*)：批判此前直接連結都市空間及居民實踐的觀點，認為實踐並不是空間的直接產物，其間有跨越、挪用、使用。

1993年阿爾塔伯將「都市和工業人類學研究群」轉型為「當代世界人類學中心」(*Centre d'anthropologie des mondes contemporains, CAMC*)，以當代世界研究取代了都市人類學研究，標誌了法國都市人類學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轉型。阿吉耶正是在1990年代開始提出他對於城市人類學的思考及貢獻。

阿吉耶於1982年1月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完成第三階段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為《商人網絡、社會網絡：洛美zongo區的蘇丹商人》(*Réseaux marchands, réseaux sociaux. Les commerçants soudanais du quartier zongo de Lomé*)，指導教授為馬克·歐傑(Marc Augé)。論文結論略做更動後，於1983年出版為《商業與社會性：多哥洛美zongo區的蘇丹貿易商》(*Réseaux marchands, réseaux sociaux. Les négociants soudanais du quartier zongo de Lomé [Togo]*)。阿吉耶曾說明自己對於城市人類學的知識建構受到阿爾塔伯相當大的影響，⁷阿爾塔伯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巴隆迪耶。阿吉耶曾經於2004-2010年間主持巴隆迪耶創立的非洲研究中心，並且其研究對象是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的城市，這個研究取向與巴隆迪耶一致，而不同於佩托內及古特維爾特在西歐和美國的城市所做的研究。綜言之，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所承續的是巴隆迪耶-阿爾塔伯這個系統。阿吉耶所要做的並非在都市中進行人類學研究，而是以人類學的方法來把握當代都市的性質，他的目標在建立一種能夠界定當代城市特性的「城市的人類學」。

7 見Agier(2009: 6)註3。

表1. 法國都市人類學的重要研究群體及代表人物

時間	1950s	1960s	1970s	1990s
代表人物	Georges Balandier	Colette Pétonnet Jacques Gutwirth	Gérard Althabe	Michel Agier
研究基地	CEAF (1957)	LAU (1985)	ERAUI (1979) CAMC (1993)	CEAF
研究取向	殖民地都市	歐美都市	都市和工業 當代世界	城市人類學

三、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

在定位了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研究在法國都市社會學發展歷史中的位置之後，本節將進一步說明阿吉耶城市人類學的研究取徑、研究架構、重要概念和論點，以及這一研究取徑的特徵。

(一) 架構及概念

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三部曲包括1999年出版的《城市的發明：郊區、鄉鎮、入侵和貧民窟》(*L'invention de la ville : banlieues, townships, invasions et favelas*)，2009年出版的《城市人類學提綱：場所、情境、運動》(*Esquisses d'une anthropologie de la ville. Lieux, situations, mouvements*)，以及2015年出版的《城市人類學》(*Anthropologie de la ville*)。在《城市人類學提綱》中，阿吉耶(2009: 6)提出城市人類學有三個殊殊而輻輳的入口：知識（人類學家的城市）、空間（作工的城市）、情境（運動的城市）。

阿吉耶的研究焦點關注於邊緣地帶，並且立足於邊緣地帶進行考察。在都市邊緣，在巴西的favela⁸、法國的bidonville，以及難民營等這些通常在市民想像中與「城市」區分開來的空間，從這些原本並不在城市規劃中的

8 Favela是巴西的葡萄牙語，相當於法文的bidonville，兩者的意思均為貧民窟。

不穩定空間，阿吉耶看到城市的開始與創生。如果我們考察哥倫比亞、巴西的大城市，會發現這些空間並不是「假城市」，而是真正的城市。

邊緣地帶生產城市，也生產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阿吉耶用「複城」(la ville bis)來指稱邊緣地帶產生的城市及城市社會學的知識。「複城」不只是知識的，同時也是對象的。做為知識，「複城」是人類學家透過自己直接置身在情境中觀察市民的實踐、關係、再現，對城市進行描述，由此產生的知識整體(ibid.)。做為對象，它指涉了在原本城市之旁、在不穩定的生活情境中所產生的「城市」。

阿吉耶關注邊緣，但他所要呈現的，並非處於邊緣狀態者的無能無助，反而是要呈現在法權上處於劣勢的人們，如何在不利的狀態中創造出城市與社會。他所關注的，並不是都市造出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人，而是人做出什麼樣的城市，「人如何做出城市」(comment les gens font la ville)。這裡所說的「做出城市」並非基於一種藍圖式、規劃式的城市構成觀，說明城市如何在物理空間中建造，而是人在情境中對城市內涵的重構。由此研究者不再只是關注有哪些事物在「非城市」(non-ville)情境中消滅，並且關注有哪些事物在「非城市」情境中誕生。換言之，在那些最不安穩的「化外之地」，浮現了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由此向我們揭示了城市的形成(Agier 2009: 11)。

在城市之中，阿吉耶最關注的是介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闕空間」(des espaces liminaires)。「闕空間」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中介空間」(des espaces d'entre-deux)，它既體現了連結，也指涉了轉變與發生。

相對於將研究焦點投注在工作場所與居住環境的二分視角，「闕空間」所考察的首先是居家空間，接著是外在空間，以及其間許多產生過渡作用的中介空間。庭院、街巷、中介(entre-deux)、通道(avenidas)，這些介於家戶和工作場所之間的空間，形成了城市的生活。阿吉耶認為，中介空間對認同的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通過中介空間，人們經歷了轉變。也是在這些空間中，誕生了都市行動的倡議，因而「闕空間」是最能夠界定當代城市民的空間。

在「閩空間」中所形成的是「間隙型城市」(ville de type intertitiel)。遊行、嘉年華、節慶發生於街道，從而這些中介空間經常成為政治開端的空間。在中介空間中形成的社群，既非原初、更非永恆，而在活動中形成和轉變。透過這些事件，城市誕生、進展和變形。

城市不再被視為一個可見的事物，也不是一個可以整體掌握的客體。城市變成一種分散情境的整體，它存在於情境中，必須從情境來理解。

阿吉耶區分了四種情境類型：一般情境(situation ordinaire)、非常情境(situation extraordinaire)、通過情境(situation de passage)、儀式情境(situation rituelle)，以描述市民與城市以及市民間的關係。由這些情境出發，探究在個體(l'individu)、空間(l'espace)和社會(la société)之間形成的關係。這些情境組成了我們可以用來探問市民生活意義的現實，透過匯集這些微觀段落，得以生產出關於城市的知識。

(二) 指向及特徵

對照1980年代法國的都市人類學潮流，阿吉耶在1990年代開始發展的城市人類學具有以下特徵：

1. 城市的人類學：阿吉耶所要研究的是「城市的人類學」，而不是在城市中的人類學，他所要創造的是一種關於城市的人類學知識，而不是以都市社區為田野場域所生產的人類學知識。然而城市範圍廣闊、內容繁雜，以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如何可能提出關於城市的知識呢？田野調查所獲得的城市知識是部分性的，並無法整體地掌握城市。要掌握城市的整體面貌，只能透過換喻（例如：城市就是街道）、比喻（例如：城市是一方馬賽克）、比較和跨學科對話。由此所提出的，就是對城市的重新界定。
2. 人造出什麼樣的城市：雖然阿吉耶要建立的是「城市的人類學」，但他的問題意識與1980年代所進行的「城市的人類學」並不相同。1980年代的都市人類學將城市當成既定的環境，個人受到都市環境的影響，都市環境多樣性所提供的自主性同樣是環境條件的一部分。相對而言，阿吉耶關注的並非都市造出什麼樣的人，而是人造

出什麼樣的城市。這時的城市並不是影響個人行為的既定脈絡，而是由人在情境中行動所形成的社會空間。

3. 情境塑造的認同：阿吉耶所要考察的，並非空間如何引導出行為實踐，也不是實踐如何挪用了規劃的空間界定，而是空間與實踐交會而成的情境如何塑造市民與市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市民對於場所的認同。
3. 關注社會臨界狀態：阿吉耶的研究關注社會變遷，但他所要探究的，與其說是社會變遷的結果或過程，不如說是社會變遷的情境。由此而來，阿吉耶對於社會變遷的考察向度從時間移到了空間，考察的焦點放在社會面臨轉變時的臨界狀態及臨界空間，特別是在原有地域社會之旁所形成的「複城」。正是由於對臨界空間及其所連繫的生命狀態之關注，使得阿吉耶的研究從「城市」朝向「營區」和「邊界」擴展。

四、生命權力與異質空間

阿吉耶於2018年以前所發表關於難民和營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本著作：2002年《在世界的邊緣：今日的難民經驗》(*Aux bords du monde, les réfugiés*)、2008年《管理不受歡迎者：從難民營到人道治理》(*Gérer les indésirables. Des camps de réfugiés au gouvernement humanitaire*)、2011年《流亡廊道：在共同世界中做為陌生人》(*Le couloir des exilés. Etre étranger dans un monde commun*)⁹。之後阿吉耶於2013年出版了《世界主義的境況：認同陷阱考驗下的人類學》(*La condition cosmopolite: L'anthropologie à l'épreuve du piège identitaire*)，該書在2016年英譯出版為《邊界：邁向世界主義境況的人類學》(*Borderlan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smopolitan Condition*)，從穿越邊界這種「平常的或『平庸的』世界主義」(*ordinary or 'banal'*)

9 此外，阿吉耶甫於2018年12月在Polity出版《叢林：加萊營區與遷移者》(*The Jungle: Calais's Camps and Migrants*)。

cosmopolitanism)實踐以及「邊界人」(l'homme-frontière)的境況，來反思現代性在當代的表現，以及人類學研究中的認同和主體等課題。

通過這些研究，阿吉耶將都市邊緣的族群聚居區、難民營、轉運中心、邊界等異質空間連繫起來，呈現這些空間中的生命情境及社會關係，說明不同空間的異形同構¹⁰，乃至其間的連續關係¹¹，由此形成系列通貫的研究。

(一) 當代性：多重的矛盾結合關係

以異質空間的生命政治為研究主軸，阿吉耶所要探究的，是在形態紛雜的現象中所共同體現的當代性。在阿吉耶的研究中，當代性表現為多重的矛盾結合關係。在此提出以下三點：

流離及拘限的矛盾結合：在流移與拘限的矛盾中體現的異質空間是「流亡廊道」(the corridor of exile)，它包含了主權國家、人道政府、難民等流移者，以及由各種不同營區、收容中心、庇護所等構成的全球網絡，而在此網絡中不同節點之間形成的便是流亡廊道(Agier 2011)。那些不受歡迎者，流亡於廊道中，拘限在營區內。

臨時與持續的矛盾結合：從他處流移而來的人群，為了安置自身，或是政權為了安置他們，採取了臨時的方式，在原本聚落之外設置了臨時營地，成為普同法權所不及的例外空間。然而這種原本做為緊急處置的安排卻持續下來，成為持久的存在，由此在既有的城市文明之外形成了「複城」，在國家領土之內創造了「外地方」。這種矛盾結合所形成的關係，正是異質空間的正常化，例外狀態的常態化。

類別化客體與浮現性主體之間的矛盾結合：一方面是在生命權力所形成的沒有公民權的人道政府，以及沒有主體的世界。另一方面則是在此看

10 參見本期思想翻譯〈生命權力以其敏感形式來檢驗：當代異質空間民族誌計畫的簡要導論〉("Le biopouvoir à l'épreuve de ses formes sensibles. Brève introduction à un projet d'ethnographies des hétérotopies contemporaines")。原刊載於 *Chimères* 74 (2011): 259-270。

11 參見本期思想翻譯〈製作不受歡迎者〉("La fabrique des indésirables")。原刊載於 *Le Monde diplomatique* 5(2017): 13。

似沒有主體的世界中，新的認同與社會關係的浮現與誕生。

(二) 浮現於生死之間：對於歐傑和阿岡本的創造性轉化

由於關注在臨時與持續之間、在生與死之間的浮現與誕生，阿吉耶得以對此前學者關於現代／超現代空間和生命政治的重要概念提出創造性的轉化。這一轉化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出發，通過人類學家歐傑(Marc Augé)及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達成。

傅柯連結了生命權力與知識，阿岡本混融了生命權力與政治。如果說阿岡本連結生命權力與政治之後所呈現的視域是死亡，那麼阿吉耶要在生命政治裡找出誕生。阿岡本和阿吉耶的不同，正在於阿岡本所呈現的是生命權力與政治融合為一之後的結構，而阿吉耶所關注的是當代生命政治與異質空間結合後所形成的情境，以及在這些情境中可能浮現的創生。

阿吉耶希望在生命權力與異質空間的連結中看到創生的可能性。「營區」和「邊界」就扮演了闕空間的中介角色。通過臨界空間的轉化作用，結構論被情境論所取代，在此代換中，死亡轉為誕生。

如果沒有異質空間，那麼生命政治就只會推導出反生命的結構。但反過來說，異質空間也是生命權力(biopouvoir)得以施作和體現的空間。從都市邊緣的族群聚居區到安置難民的營區，生命權力的運作隨著難民無國家的(stateless)的身分狀態而更為顯著，具有社會性的人(person)更大程度地被界定成生物性的個體(individu)，無數個體匯集成為人口(population)。就社會性的發展而言，難民的聚集會浮現「城市」；但就法權的運作而言，難民的所在卻會形成普同公民權所不及的「外地方」(hors-lieux, out-places)。

「外地方」的社會意涵，在和人類學家歐傑的著名概念「非地方」(non-lieux, non-places)相對照之下會更為清楚。歐傑(1992: 100)以「非地方」來指稱「超現代性」(surmodernité)下的空間經驗。「若地方可以界定為認同的(identitaire)、關係的(relationnel)、歷史的(historique)，那麼一方無法界定為認同的、關係的、歷史的空間，便可定義為非地方」；¹²「超

12 為提供理解文義的參照，以下列出陳文瑤的譯文：「若說地方的定義是具歸屬

現代性是非地方的生產者」，它不生產人類學者與其研究對象的「共有之地」(lieu commun)，也不生產歷史學者所指認與社群歷史相關連的「記憶之所」(lieux de mémoire)。「非地方」是因應交通、轉運、商貿、休閒娛樂等目的所形成的空間，相對於人類學的地方是由有機的社會關係所創造，非地方則是由孤獨的契約性(la contractualité solitaire)所產生(ibid.: 118-119)。「旅人(voyageur)的空間是非地方的原型」(ibid.: 110)，但非地方中的行動者並不是旅人，而是過客(passager)；相對於居住(résidence)或停駐(demeure)，過客與空間的關係是過境(transit)(ibid.: 134)。「非地方」所指稱的是在兩個目的地之間通過而不停駐所形成的人地關係，在某個意義上，是一種人地無關，一種在穿越性移動中的短暫交會。值得一提的是，歐傑在提出「過境」(transit)時所舉的例子，除了過境旅客(passagers en transit)，還包括臨時難民營(les camps de transit)，¹³後者在阿吉耶對難民和城市邊緣移民的論述中，被界定成一種「外地方」。

「外地方」是外在於所有地方的地方。阿吉耶的「外地方」所要體現的不是被視為常態世界的流動狀態(mobility)，而是被視為異常世界的拘限狀態(confinement)。他所要說明的不是在流動當中難以形成的人地認同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反地，他所要考察的是在治外法權的例外情境中的懸滯狀態。

「外地方」外在於所有被指認為普同法律所適用的領地。這些「外地方」，或是定著空間，但卻被界定為法律的例外之地；或是移動空間，隨著不受歡迎者的身體浮動在國土之上。

與「外地方」相連繫的是「治外法權」或「外地方方法權」(extraterritorialité)。這個詞的原意是指某個國家允許另一國家或國際組織於其國境內行使法權，或是反過來說，某個國家要求另一國家同意在其境內對涉及該國人民的外事准用該國法律。換言之，這是超出自身領土範圍

感、包含人際關係且擁有歷史性，那麼一個不具歸屬感，沒有人際關係亦非歷史性的空間，便可定義為非地方。」(Augé 2017: 85)

13 此處「過境旅客」和「臨時難民營」引用陳文瑤的翻譯，見Augé(2017: 110)。

airiti

之外的國家法權實踐。但阿吉耶轉用這個詞的意義來說明：某國允許其國境內的某處被當成非同於一般國境的「外地方」，以便讓不受歡迎的移民或難民可以不必適用較為符合人道精神要求的一般法律；其目的不是為了將法律延伸到國土之外，而是為了將不受歡迎者所置身的國土界定為「境外」。從而此一體制所要治理的「外」，並不是地理空間的外在，而是法律空間的例外。由國際公法所約定的「治外法權」，變成國內特別法所限定的「外地方權」；由外國人治理，變成治理外國人。「額外」(extra)領土，實為國家法律上的例外空間；「外地方」，實為「城內外方」。

(三) 從「社會變遷的都市人類學」到「當代異質空間民族誌」

阿吉耶將人類學界定為一種探討場所及關係的意義之學問，由此在人群、時間、空間這三個向度中突出了人群與空間，不論是「闕空間」、「外地方」、「間隙型城市」，甚至是「複城」，所提供的都是從空間面向切入所進行的理解，時間的面向被化約為當代性。

「複城」這項知識計畫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在分梳城市所對應的不同的歷史性，而在說明城市中各種中介空間及情境認同的當代性。這項知識計畫所要說明的，並不是城市如何從遠古建立並承襲了獨特的文化內容，而在說明當代流移情境中建立的情境認同，以及在不穩定的生活情境中重新建立的關係。它要說明的，不是古老城市的延續，而是當代「城市」的誕生。

雖然阿吉耶承襲了巴隆迪耶對社會變遷的關注，但他並非從時間向度去處理變遷問題，而是拋棄過去對殖民地的理解範型，直接從變遷後的當代性去把握第三世界的城市樣貌。雖然阿吉耶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社會變遷的都市人類學研究」，但是他所關注的並非變遷的歷史過程，而是城市市民在各種情境及中介空間中，透過各種運動形式所帶動的各項轉變。

由於阿吉耶是以對空間的思考來討論當代性，使得社會變遷被化約成社會空間中的變化。如果將「闕空間」與范傑納(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的「通過儀式」(rites de passage)相對照，我們可以問：在通過儀式中，個體(individu)通過儀式過程而成為具有社會性的個人(person)，那麼經歷「闕空間」的個體，又會變成什麼樣的存有，對所處社會帶來什麼樣的

改變？儀式是時間與空間的結合，儀式在時間中表現為儀式過程，儀式過程發生在儀式空間之中，由此在參與儀式的社群成員之間產生社會連帶。然而在當代的「闕空間」中，特別是在難民營這樣的邊緣空間，難民在流亡前所處的社會已然不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所生產的是與主流社會相區隔的人。新的社會關係誕生在主流社會之旁，主流社會的秩序受到影響，但結構並未被撼動，從而我們看不到社會變遷，而只看到人與地、人與人的關係在情境中的變化。

五、結語：在當代流移情境中再造人的世界

如果阿吉耶「外地方」是對歐傑「非地方」的致敬，那麼《世界主義的境況》(*La condition cosmopolite*)則是對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著作《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1958)的致敬。鄂蘭的「世界」，就如同人與人之間的桌子，它既將人們分隔開來，卻也將人們聯繫起來。世界的消退，相對的正是荒漠的擴張。

當代民族國家對待難民和移民的方式，使得原本做為通過儀式的邊界情境無盡地延長，讓間隔持續存在，讓例外變成常態。在等待區中，時間懸滯，不確定狀態持續，社會性的個人被化約為生物性的個體。跨越邊界卻懸滯在營區的「邊界人」，當他們在中介空間中投身行動，他們所要求的是在共同世界的邊緣成為人；不是為了成就與聲名，而是不願如同蜉蝣一般倏生倏滅，默默地死去。阿吉耶致力研究城市和營區，其背後的關懷在於人的復歸和共同世界的再造。這時指出「城市」的誕生，不只是為了考察歷史城市與當代「複城」的平行並置，而是提出再造共同世界的期盼。

引用書目

Agier, Michel. 1981. *Réseaux marchands, réseaux sociaux. Les commerçants soudanais du quartier zongo de Lomé (Togo)*. Paris: Editions de l'ORSTOM.

———. 1999. *L'Invention de la ville. Banlieues, townships, invasions et favelas*. Paris: É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 airiti
- . 2002. *Aux bords du monde, les réfugiés*. Paris: Flammarion.
- . 2008. *Gérer les indésirables. Des camps de réfugiés au gouvernement humanitaire*. Paris: Flammarion. (English: Agier, Michel. 2011. *Managing the Undesirables. Refugee Camps and Humanitarian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 Polity.)
- . 2009. *Esquisses d'une anthropologie de la ville. Lieux, situations, mouvements*. Louvain-la-neuve: Academia-Bruylant.
- . 2011. *Le Couloir des exilés. Être étranger dans un monde commun*. Bellecombe-en-Bauge: Éditions du Croquant
- . 2013. *La condition cosmopolite: L'anthropologie à l'épreuve du piège identitair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nglish: Agier, Michel. 2016. *Borderlan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smopolitan Condi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 Polity.)
- . 2015. *Anthropologie de la ville*. Paris: PUF.
- . 2018. *The Jungle: Calais's Camps and Migrants*. London: Polity.
- Althabe, Gérard. 1984. "L'ethnologie urbaine : ses tendances actuelles," in *Terrain* 3: 3-4.
-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ugé, Marc. 1992. *Non-lieux. Introduction à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surmodernité*. Paris: Seuil. (English: Augé, Marc. 1995. *Non-Places :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London: Verso.) (中譯：Augé, Marc。2017。《非地方》，陳文瑤譯。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 Balandier, Georges. 1957. *Afrique ambiguë*. Paris: Plon.
- Gutwirth, Jacques. 2007. "L'anthropologie urbaine en France." HAL: halshs-00267536.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267536/document>。 (accessed 2018/12/20)
- Unknown author. 2011.09.25. "Michel Agier," Centre d'études africaines(CEAF). <http://lodel.ehess.fr/ceaf/document.php?id=36> (accessed 2018/12/20).